

【一般論文】

# 重新認識現代性的必要： 來自概念史與知識社會學的初步反省\*

湯志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The Necessity to Re-cognize Modernity Again: Some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from the Conceptual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Knowledge

by

Chih-Chieh Ta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ctang@gate.sinica.edu.tw

---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中研院社會所主辦之「重探東亞與西方的現代性：理論系譜與歷史比較」(2017年3月24、25日)，感謝朱元鴻及其他與會者的評論和建議，以及科技部(MOST 103-2410-H-001-083-MY2)與中研院(AS-105-TP-C01)對本研究的資助。欲更完整了解此議題所涉及的文獻，請參見未刪節的初稿。

收稿日期：2017年6月2日；通過日期：2018年1月5日

## 摘 要

本文主張，對台灣人來說，重新認識現代性既是認識論的，也是倫理學的要求。一旦我們敢於拋棄習以為常的觀點，將現代性問題化，梳理它在歷史中的偶連性與複雜性，將清楚認知到，主流的現代性理解實是套歐洲中心的霸權論述，不但形塑出許多關於歐洲的迷思，亦常令我們誤認自身的歷史，乃至樂於此而不自知。本文將透過對現代、現代性的概念史研究，以及對現代化、現代性研究的知識社會學考察，將它們擺回到東、西方與歐、美霸權消長的實際歷史脈絡中，探究西方概念涵括對象的變化，具體論證現代性何以是霸權論述。秉此認知，本文呼籲，我們應尋找在地立場的認識論位置，以之打造符合台灣主體性的世界觀與歷史觀。

關鍵詞：現代性、概念史、西方、歐洲中心、台灣立足點

## 一、重新認識：認識論與倫理學的雙重要求

常自詡為現代之子，以探討、釐清及診斷現代社會為職志的社會學，還需要認識，特別是重新認識現代性嗎？對這的探討不正是社會學的看家本領與整個研究傳統的精髓所在？我在此夸言需重新認識，豈非要顛覆，甚或拋棄西方 19 世紀以來建立的傳統？身為「後學」的台灣社會學家，憑什麼做此大膽宣稱？

我的憑藉無非是我們立足於台灣這個事實。按「立足點理論」（Harding ed., 2004；另見 Bourdieu, 2004: Ch. 3），台灣既然是我們賴以生活，並由以觀察、認識世界的出發點，那麼從台灣的立場重新認識現代性，就不只是個帶有倫理意涵的要求，同時也是認識論上的迫切需要。<sup>1</sup> 一旦我們敢於拋棄習以為常，以致渾然不覺的歐洲中心視角，將現代性問題化，梳理它在漫長歷史演變中牽涉到的諸多偶連性與複雜性，將清楚認知到，當前的主流現代性理解實是套霸權論述，不但形塑出許多關於歐洲的迷思，亦常令我們誤認東亞的歷史，乃至樂於此而不自知。例如，我們常以 19 世紀的西歐國家為民族國家的範例，卻忽略它們同時是殖民或帝國主義國家，而印度的「種姓制度」則是被殖民者把西方的發明當成自己的真實的著例。視中國為長期停滯的帝國，或認定清代台灣係與世界失去貿易連繫的落後孤島，則是與我們自身歷史有關的顯例。

作為非西方的邊陲，台灣更可提供西方與中心所無或較難獲得的

<sup>1</sup> Harding 雖較強調立足經驗的不同而來的差異，及藉由經營與鬥爭捍衛自己立足點的必要，Bourdieu 則側重反身性的問題，但兩者皆要求正視、反省自己的立足點何在，且皆會導出，回歸自身的立足點認識世界係正當且迫切的認識論與倫理學的要求。本文援引立足點理論的用意也在此，而非表示採取後殖民的立場。

觀察利基。人類學早以其學科歷史揭示我們，繞道異己雖看似迂迴，在自我反省與批判上實更有效。透過與他者的比較，我們更易察覺自己習而不察的盲點。面對現代性的問題時，這尤其重要。因為我族中心雖是人類恆有的傾向，現代性卻創造出貌似普遍，從而更為牢固的「我族中心的囚牢」(Taylor, 1995)。經過語言學轉向洗禮的 Peter Wagner (2008) 雖清楚認識到，沒有發明現代性概念的話，便無現代性可言，強調需區辨作為「經驗」與作為「詮釋」之現代性的不同，但他畢竟仍處於西方發動的現代性論述洪流中，不易與其拉開距離，更無法把自己提到西方之外來觀察，故無法充分且全面地認識到內建於現代性的歐洲中心論盲點。處於台灣的觀察位置，擁有與西方不同的思想資源、歷史理解與現實感受，我們毋寧更有條件看出既有現代性論述的盲點，重新思考現代性的意義，以及我們與它的關係。

撇除早於 1990 年代初便引進後殖民的觀點，之後也非常流行使用「現代性」一詞的文學研究不論，史學、文化研究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在邁入 21 世紀後，也紛紛展開對殖民現代性、另類現代性的研究，或是從後殖民、另類現代性、重層現代性、多元現代性等觀點進行反思（如見李尚仁、張隆志、傅大為、陳光興、林崇熙等人的相關研究）。這些研究雖未必直接以現代性為主題，但藉由實際的研究與論述開展，都對反省及建構台灣自身理解現代性的立足點做出貢獻。

比較可惜而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社會學界雖先後有朱元鴻及張君玖譯介後現代與後殖民理論及從事相關研究，但整個社會學界對現代性的探討不但少而晚，且幾乎不受後殖民觀點影響。我在檢索相關資料後發現，一如國際學界，台灣的社會學者在 1990 年代以前很少用現代性一詞。就是到今天，收錄在資料庫裡，以現代性為關鍵詞的社

會學文獻，依然寥寥可數。<sup>2</sup> 這反映出台灣社會學者對現代性議題不感興趣，連帶質疑及反省此概念的機會也相對少，極可能依成長及學習過程中習得的既有主流論述來認識它。或也因此，儘管我間或發現有學者表露出源自台灣立場的不同觀點，但多數人似仍習於追隨源起於西方的主流現代性論述，相信歐洲邁入現代性的發展不但創造出古今的斷裂，也令歐洲有別於世界其他地區，而很少覺察其中隱涵的歐洲中心論。

例如，黃瑞祺（1996）發表於因後現代的挑戰而在西方掀起現代性研究浪潮後的論文，是台灣社會學界最早正式探究現代性議題的代表，也框限了後人的理解。他不但直言現代性等同於「近代西方文明的特性」，以「理性」為核心，還逐步依城市復興（11-13世紀）、文藝復興運動（14-15世紀）、海外探險及殖民主義（15-19世紀）、資本主義（14-20世紀）、宗教改革（16世紀）、民族國家（15-17世紀）、民主革命（17世紀）、科學革命（17世紀）、啟蒙運動（18世紀）、工業革命（18-19世紀）考察其歷史軌跡。他進而在認定現代性具有積累、擴張特質（表現在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基礎上，以「現代性的漩渦」的講法反駁競賽的觀點，主張源起於西歐、北美的「西方現代性」先是波及非洲、美洲，繼而波及印度、東南亞、中國、日本，終於席捲全世界，以致現代化其實就是西化，並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步入「全球現代性」的階段，連第三世界都現代化了，令全球成為一個「現代世界」。

黃文雖標舉歷史社會學的進路，卻不曾「歷史地思考」，將偶連性與未被選擇的可能性納入視野，反而在再現時，只凸顯一條鮮明的

---

<sup>2</sup> 因篇幅與時間所限，須他日另文才能探討現代性概念在台灣社會學界的繼承史。

線性發展軌跡，既不斷向前回溯現代性的根源，又有淪為目的論的疑慮。在渾然不覺數百年的實時發展與共時性的全貌概念不盡協調，並片面強調「理性」的情況下，黃文不但有事後證成與時代錯誤的問題，更反於意圖地變成歐洲中心論與西方霸權的積極擁護者。黃文雖指出現代化論與美國霸權的關連，卻不曾反身地思考，他的論述會帶來歐洲獨力發展出現代性的印象，及造成讀者認同歐洲自始優越的效果。他視全球化為晚出及現代性的後果，應是師承其老師 Anthony Giddens 的說法，但把現代性上溯到 11 世紀，無疑是其自加的觀點。或有人認為這是無關緊要的歷史錯誤，但實際上往往正是這些似是而非的歷史認識鞏固了歐洲中心論，形塑出西方不可挑戰與超越的意象與我們自己被俘虜的心靈，以致沒勇氣不向西方學習，不敢在認識論上踏出解殖的轉向。

第二個例子是李丁讚、吳介民（2005）對地方公廟的研究。該文探討現代性、宗教與巫術的關係，對現代性的界定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質」，但在強調隱涵時間斷裂的「大轉折」的同時，又說現代性是個「深刻、漫長而全面的轉化過程……從文藝復興開始」，經歷了「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等歷史進程。該文羅列的歷史事件與黃瑞祺大同小異，而未意識到漫長轉化過程的說法不但與從傳統到現代的斷裂意象矛盾，還會證成歐洲長期優越的神話，顯見這是多數人的「常識」或「共識」。他們認為，啟蒙運動以來對現代性的樂觀期待要到 Baudelaire 才有所轉變，現代性變成是「對『當下』的一種反叛和轉化……真正的『現代人』，絕不會接受當下所面臨的處境」，而是會「把自己當成一個對象或客體」進行操作和控制，以「成為另一個人」。然而，根據實際歷史發展來說，Baudelaire 其實是現代性概念的締造者，而非改變其意涵的竄改者

(詳後)。

李、吳兩人從現代化與民間信仰的弔詭談起，但未完全拒斥現代化理論世俗化的除魅過程造成宗教衰退的說法，<sup>3</sup> 僅將其降格為片面的真理。藉由引進治理性的概念與宗教市場的研究取徑，兩人雖成功解釋了宗教與現代性看似背反的現象，卻未正面挑戰世俗化的命題是否適用於台灣，以及可否、應否把西方經驗當量尺的問題，以致在對現代性與宗教的理解上，似隱隱仍奉西方的理論與經驗為典範。他們認定「巫術社群」為「現代社群的原型」，有開展出不同於西方現代性論述的潛能，可惜未發展。

黃金麟、汪宏倫與黃崇憲編的《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黃金麟等編，2010）是最後的例子。這是台灣第一本討論台灣現代性發展的社會學專書，全書對現代性卻無統一的理解架構。該書雖企圖糾正非西方只有「遲到的現代性」的偏見，卻僅有少數文章討論或引入後殖民、後現代與多元現代性等不同看法，以致多數人對現代性的理解雖或類似美國主流社會學界的立場，但與國際社會學界的最新反省卻有落差。因此，儘管該書大幅推進了本地學界對現代性的理解，卻依然未能跳脫誤認歐洲及台灣歷史的陷阱，誤以為歐洲 16 世紀時政治與經濟的現代性便趨於成熟，並顯現出相對於其他地區的優越性，而 17 世紀清帝國治下的台灣卻仍處於停滯的封建體制。

有鑑於現實情況如此，本文雖受後殖民觀點啟發，但未嚴格追隨後殖民的進路，也不把重點放在已有較多人從事的，對殖民性與權力關係的析辨與批判，或是分析在地認同及主體性如何形塑與建構，而

---

<sup>3</sup> 相對於 1970 年代末以來，多數社會學者明白否定現代化理論，到 1990 年代現代性議題興起後，多數人對現代化理論的態度毋寧變得曖昧，黃瑞祺的文章亦有類似現象。

是選擇聚焦於較少被注意的，對西方的實際歷史進程進行探究與檢討，亦即以現代性的概念與論述的發展為例，以真實的西方本身為分析對象，檢討其與我們今日熟知的西方意象（某意義上即主流的現代性理解）間的落差，從而隱涵了從本土立場對西方意象的殖民與霸權性格的檢討和批判，但並非直接以此為主軸。需先說明的是，受限於學養，我尚無力對現代性從事完整的系譜爬梳，遑論顛覆整套現代性論述，但願借鑑系譜學研究的批判精神，將現代性問題化，一方面藉以了解現在何以如此，探尋未來轉變的可能，另一方面藉以反思台灣與世界的關係，進而探尋台灣認識現代世界的適切觀點何在。

以下，本文將透過對現代、現代性的概念史研究，討論現代的多重意涵，指證晚出的現代性概念充斥著歐洲中心與現在中心的成見。然後，本文將藉由對現代化、現代性研究的知識社會學考察，探究當前主流現代性理解形成的軌跡。本文嘗試把前兩項研究擺回到東、西方與歐、美霸權消長的實際歷史脈絡中考察，連帶探討西方概念主要指涉與涵括對象的變化，以具體論證現代性的確是套歐洲中心的霸權論述。秉此認知，本文最後呼籲，我們應積極尋找在地立場的認識論位置，以之打造符合台灣主體性的世界觀與歷史觀。

## 二、概念史的釐清：多義的現代與晚出的現代性

重新認識現代性可有多種途徑，我選擇從概念史與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入手，係基於人對現實的認識絕大多數係經由語言媒介。考察現代性的概念與論述形成，因此大有必要。Foucault、Skinner 及 Koselleck 的研究不約而同揭露了，支配當前政治與智識生活的概念

與論述，大約皆形成於 18 世紀晚期到 19 世紀初期。現代性概念無疑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引領我們的觀察與思考至今。何況，這是最基本的釐清功夫，先弄清楚概念本身的來龍去脈，理解它在何時空環境下為何及如何為人使用等基礎事實後，才足以談其他。Wagner 本身研究現代性歷程的轉變，適是證明由此角度探討有其必要的佳例。

在最早 1994 年的 *A Sociology of Modernity: Liberty and Discipline* 一書中，Wagner 已留意敘述現代性的不同模式，強調現代性令人愛恨交織的兩面性。但他基本上仍依過去傳統，以「自由與規訓」這兩項——不無可能是期望所導致或事後投射出來的——實質內容來界定現代性，且是站在自由現代性受到限制此一當下危機的時點，往前回溯現代性的發展。到 2001 年出版的 *Theorizing Modernity: Inescapability and Attainability in Social Theory* 時，Wagner 便露出過渡的徵兆。在延續把重點擺在實際的經驗，探討知識的確定性、政體的生存能力、自我的延續、過去的可及性與未來的透明度等議題的同時，他用後記凸顯了歷史性與多元性的重要，並帶入 *problématique* 的概念。接著，Wagner (2008) 賦予「詮釋」與經驗同等的重要性，用 *Modernity as Experience and Interpretation: A New Sociology of Modernity* 宣告一套新的、超越制度分析的現代性社會學，並分別依現代性所環繞之政治的、經濟的及認知的 *problématique* 進行剖析與探討。到 2012 年最新的 *Modernity: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Wagner 在「理解現在」的企圖下，開始把目光望向西方之外，提出「邁向現代性的世界社會學」的構想，以回應後殖民、多元現代性與相互連結的歷史等蓬勃發展的知識潮流。

儘管 Wagner 的研究表現出高度的自省，並不斷隨時代變動（既包括知識上與學術上的，也涉及政治、經濟及文化的改變）做調適，

但若與本文以下的討論對照，我們可輕易看出 Wagner 對歐洲中心論的反省仍有不足的盲點。

## （一）現代作為現代性概念的史前史

依 Jauß (1971) 與 Gumbrecht (2004/1978) 的概念史研究，拉丁文的「現代」(modernus) 一詞 5 世紀即出現。人們創造這個新詞，以區別剛掙得承認的基督教與所謂「異教徒的」羅馬社會。因此，自誕生伊始，現代一詞雖未逕自強調當代的就是好的，但刻意的今昔對照不免隱涵有與過去斷裂的企圖與欲望。不難想像，歷史上會一再出現類似這樣希望與過去保持距離，透過對現在的反省與批判，尋覓未來方向的事。6 世紀初，羅馬政治家卡西奧多羅斯 (Cassiodorus) 甚至就已經以時代區隔的意涵使用現代一詞。然而，如他自稱為「勤勉的古代模仿者」所顯示的，古今對照雖會一再出現，但不一定會發展為古今之爭，更不必然往新的就是好的方向發展。在 11 世紀教會與君王關於「敘任權」的爭奪中，便不乏認為現代是個有待克服的時代的看法。從負面眼光看待現在的主張在中世紀雖係少數，但就是推崇現在的文藝復興，也從未因崇今而薄古，反而是讚揚古代智慧的流傳係現代得以發展的前提，以致有人稱「現代」不過是站在古代巨人肩上的「侏儒」罷了。

不過，隨著時間的演進，文藝復興運動慢慢走出「模仿」的原則，開始強調「競爭、匹敵」(emulation)。到 15 世紀末，認為從古代的繁榮，經基督教時代的衰退，再到文藝復興的三階段論，變成時人不言自明的歷史圖像，並成為日後視中世紀為黑暗時代的起源。大約在這時，隨著各民族語言的形成，現代一詞陸續出現在義大利

文、法文（14 世紀）、西班牙文（15 世紀）、葡萄牙文、英文（16 世紀）、荷蘭文、瑞典文（17 世紀）、德文（18 世紀）等語言裡（Hunt, 2007: 48-49）。

儘管如此，一直要到 17 世紀的啟蒙運動，由 1687 年法蘭西學院關於「古今之爭」的會議揭開序幕，才徹底拋棄以古代為榜樣。但現代較古代猶勝的優越感實非一場文化戰爭所能一夕底定，而不免是個漸進的過程。這具體反映在 17 世紀前半葉以現代為題的英文書為數仍少，要到下半葉才告激增。重要的是，這種優越感讓人們告別了仍支配著文藝復興的循環的歷史圖像，走向歷史不斷進步的模型，並逐漸發展出階段論的看法。同時，這不只逆轉了古今評價上的位階，也顛覆了專家與大眾評價上的位階，開始正面看待平民百姓的參與（Hunt, 2007: 49-50）。

## （二）從年代的順序到質的迥異

Koselleck（2002）的研究指出，「現代」一直要到 18 世紀才開始起了如今的歷史分期作用，但最初也只是個中性的分期，沒任何實質內容，主要作用在承襲、沿續文藝復興的概念，把先前的時代建構為黑暗的中世紀。是在啟蒙運動的進展與浪漫主義的回應共同作用下，現代的概念才不再僅限於編年的、線性往前的意涵，而日益凸顯出質上超越以往任何時代的強烈價值意涵。工業革命及法國大革命促成人們普遍感覺到「加速」的歷史經驗，令現代的概念更普及，以致時間也獲得了歷史的性質，而不再被視為容器，僅是歷史在其中發生的媒介，亦即歷史不再僅是發生於時間中，更是透過時間而發生。Osborne（1992）也說，現代不只是年代順序的範疇，更指涉一個質

上截然不同的範疇。

既然現代涉及今昔質上的差異，不同領域的斷代點便可能有所出入，以致對現代究竟指涉什麼，該依何種判準界定，有形形色色的理解。不同領域的學者偏好按其專業觀點提出自己的現代判準，而未必依古代、中世紀、現代的通俗三分架構，以文藝復興或君士坦丁堡「陷落」（1453）為現代的開始。例如，不少文化史家與宗教學者認為16世紀馬丁·路德引發的宗教改革才是邁入現代的分水嶺，因為去除教會中介的關鍵後果與其說是凸顯上帝，不如說是確立個人。但多數哲學家卻喜歡採理性與主體的視角，以17世紀的啟蒙運動為現代的始點，一些史學家則傾向認定18世紀不斷進步的觀念才彰顯了現代的時間意識。大多數社會學家則習慣以社會結構的轉變為判準，主張所謂的雙重革命，即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才是轉捩的關鍵，把現代的開端推遲到接近19世紀。

### （三）斷裂抑或連續漸進

路德在教堂大門釘上九十五條論綱此一後世敘述中引發宗教改革的革命性作為，實際上是當時的慣行（Morris, 2010: 447-448）。這不但提醒我們留意因著社會自我指涉的運作而來的循環的因果性的問題，需從二階觀察的角度分析，為何特定時代、特定領域的人們會如此觀察外，也明白指出，現代性到底涉及斷裂還是連續，取決於觀察的角度。

以「工業革命」為例，在「爆發」伊始，恐怕極少，甚至不太可能有人會用「革命」的字眼來描述它。因為直到16世紀為止，revolution指的主要是往復遞迴的物理運動，特別是天體的循環運

動。自 16 世紀起，才慢慢發展出具政治意涵的字彙 revolt（反叛、造反）。雖然 15 世紀起，revolution 已兼有改變、交替之意，但它與 revolt 匯流，被農民、叛變者用來正當化自己的反抗行動，演變出具政治意涵的革命之意，特別是指短時間內的劇烈變化，無論如何是 17 世紀的事，而且直到 1688 年光榮革命時，仍與舊有的意思重疊。1789 年的法國革命才真正確立了它的現代意涵，但這相當程度是靠托克維爾 1856 年出版的《舊體制與大革命》的事後證成。恐怕要到 19 世紀，藉由與演化的對比，革命一詞才跨出政治領域，變成廣泛用來指涉任何領域帶有進步意涵的急劇變化（Conze, 2004; Williams, 1983/1976）。雖然 19 世紀初有不少法國作者在類比大革命的意義下談及產業中的「革命」，特別是機械造成的改變，但 Williams 關於英文關鍵詞的研究明確指出，把工業革命視為新社會秩序的建立而不僅只是指技術革新的話，不會早於 1830 年代（Williams, 1983/1976: 138）。

Shapin（1996）也挑釁地說，沒有「科學革命」這回事，所謂「新」的觀點與方法仍建立在之前的基礎上。是無數人的努力積累，在科學、宗教與國家等不同力量的複雜角力及互動下，逐步推動科學事業向前發展。後人會誤認有無中生有般瞬間突破的革命性劇變，是因為那些後來被封作革命先鋒的祖先們運用了這一類的修辭來形容自己的成就，就像我們在現代及現代性的概念史裡常看到的一樣。

#### （四）投射期望之待完成的方案

就是 18 世紀末彷彿一夕間改變整個世界的法國大革命，實際上也沒提供太多新東西，而不過是令其「加速」而已。法國大革命與其

說是新期望與新的時間性想像到來的結果，不如說是徵候。現代社會的誕生與現代性概念的形，有賴諸多相伴而來的語意與論述的促成與鞏固。就是「社會」概念本身，也是現代的發明。而諸如革命、民主、進步、歷史、危機、聯邦、解放、國家、市民社會、自由等一大批 18 世紀中葉才形成，或重新被賦予新義的舊詞，常常單數集合名詞用的「現代的」概念，特色之一在包含期望的面向、指向未來。換句話說，這些歷史語意並非單純是反映時代變化的如實紀錄，而更常是催化或加速時代變化的象徵鬥爭工具。它們所指涉、企求的對象，往往還未真正誕生或鞏固，而需靠這些語意協助其實現。就像法國大革命變成正面評價的象徵，相當程度是托克維爾事後今昔對照之功，把它理解為一個不可逆，同時卻又不曾終結的根本改變的過程。也因此，包括「現代」在內的現代概念，在時間化之外，常兼有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及向大眾普及的民主化等特徵（Koselleck, 2011）。

所以，現代性的確是 Habermas 所謂「待完成的方案」(unfinished project)，但並非遭逢後現代論述挑戰後才曝露出其未完成的一面，而是自始便是個投射到未來的規劃，不但有想像的成分，也會與現實衝突，是個充滿高度張力的場域（Arnason, 1991）。雖然我們未必想像 Latour 般主張「我們從未現代過」，但必須認知到現代的進程不像流行歷史敘事說的，早在 16 世紀便展開。同時，我們更要對現代性概念保持認識論上的警惕，莫忘它就如其他現代概念一般，最早皆是象徵鬥爭的工具，係立基於特定的意識形態立場。

## （五）確定性的喪失與晚出的現代性概念

「現代」除前述當前的、新的及作為時代區分的意涵外，還有

第三個意思，即短暫的、轉瞬即逝的。這樣的意涵之前隱而未顯，要到 19 世紀才日益為人所用及所知，最後才衍生出「現代性」一詞（Gumbrecht, 2004/1978）。換句話說，雖然現代的概念有漫長的歷史，但嚴格意義下的現代性概念，問世不過一世紀左右。Baudelaire 曾對現代性下了個可說最早也最著名的界說，指的正是過渡、短暫、偶然。轉換成 Wallerstein（1996）的社會科學語言來說，即是將變化、制度化、常態化。Baudelaire 會用現代性的概念，是試圖調和瞬間與永恆的弔詭，希望證成在對當前生活的藝術模寫之瞬間的美中，一樣能找到與古典作品媲美的永恆價值。也因此，關於現代性的討論最初集中於藝文界，古典社會學其實不太談。

社會生活全方位的加速，不但造成轉瞬即逝，更帶來確定性的喪失，而這一直是現代性的重要內涵之一。改變的常態化、正常化，更先後激發了保守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等不同意識形態的政治方略，從而導致各式各樣的紛爭與衝突。我們不妨這麼看，17 世紀啟蒙運動所標榜的樂觀進步理念，毋寧要到 18 世紀才慢慢在社會層面實現，到了 19 世紀，隨著前所未有的各種社會問題的產生，逐漸陷入遏止不住，無法煞車的窘境，也因此到世紀末可謂充滿危機意識，在攀上繁華自信高峰的同時，也陷入深刻的自我懷疑與自我反省，以致悲觀主義與享樂主義攜手而行。

社會學的誕生，本身便是對此危機的回應，企圖釐清正在發生的時代鉅變，並因此產生了社群／社會、身分／契約、機械連帶／有機連帶、封建／資本主義等著名二分。然而，這卻是種「非歷史的歷史主義」。古典社會學雖試圖從歷史的視角來理解、掌握現在，但實際上並未採取「歷史地思考」的態度，真正貼近偶連、多變的歷史現實，而常把自己的觀點投射到過去。值得注意的是，歐洲雖因社會變

遷過快以致憂心忡忡，並在危機意識驅策下對自己進行深刻的反省與審視，但當面對非西方社會時，卻不免充滿優越感，而這往往正是以所謂的現代性來證成。韋伯在憂慮「鐵的籠牢」的同時，不免流露出「身為歐洲文明之子」的自傲，馬克思在指出「剝削」與「異化」的同時，也發明了「亞細亞生產模式」的概念，便是顯見的著例。有社會學之父稱號的孔德，更是令「西方」變成重要政治、社會概念的關鍵推手。

## （六）始終看不到的歐洲中心與現代中心盲點

前面的事例清楚顯示，不論是現代社會發展本身，還是人們對它的觀察，往往是雙義而矛盾的（ambivalence）。有學者因此主張，現代性不是個概念，而不過是各種各樣的敘事類型。其實，尼采早指出「概念」是無法定義的，因為它牽涉到整個複雜的歷史過程。但儘管概念始終保持多義，卻不妨礙它可以是清楚的。現代與現代性概念本身便見證了這一點，儘管人們對它們的看法極分歧，還是能找到多數人接受的核心意涵。從後設的角度來看，這些不同的看法更共享相同的盲點，不自覺地支持西方中心的史觀，強調西方文明或社會在觀念或制度上優於其他社會，而很少考慮到現代世界的樣貌，其實是由各地的發展與諸多的歷史偶然交錯形成的結果。

意圖證成西方當前的統治有其合理歷史基礎的 Morris（2010: 14）也承認，從 1750 到 1950 年間，流行的皆是他所謂西方具有長期鎖定優勢的看法。因此，在現代與現代性的議題上，我們可發現一個有趣的矛盾。19 到 20 世紀初的西方觀察家在觀察自己身處的當代情境時，傾向強調現代與傳統的斷裂、不連續，但當他們將西方與其

他地區比較時，卻傾向主張所謂的現代性優勢是長期積累的結果，淵源深遠。這種內外有別的態度，正是迄今主流現代性論述看不到的盲點。它彰顯出，現代性固可以是西方深刻的自我反省，但也可以是西方自我防衛與證成其支配的語意工具。雖然現代性論述最初也看不到現代性的黑暗面，看不到自己內部的宰制與不平等，但這比較像佛洛伊德所謂的「壓抑」，只是被埋在深處，仍有返回的可能。相對地，否定西方以外的地區曾貢獻於現代性的誕生及運作，卻是將其徹底地排除在外（foreclosure），彷彿從來不曾發生一般（Hardt and Negri, 2009: 69）。

遺憾的是，隨著現代性概念的日益流行，我們不但愈來愈習慣它的觀察角度，而很少意識到它建立在今／古、西方／非西方的二分上，從而將後者排除在外，就連它原本是有特定立場的象徵鬥爭工具這點都忘了。由於現代性的概念意涵了性質與狀態，在歐美社會 19 世紀以來實際政經優勢的加持下，現代性的概念不但一再被賦予各種魅力，更享有認識論上的特權，從而日益強化與鞏固西方自始享有優勢的本質論看法，一筆抹煞掉西方霸權之前的東方霸權、西方中心剝削邊陲，以及西方得以稱霸的偶連性等歷史事實（Mignolo, 2002），也常讓人忽略乃至遺忘現代性所帶來的黑暗面。如 Hunt 對現代性如何形塑了我們的歷史思考的深切反省所指出的，與現代性攜手同來的現代史學內建了一種時間的優越感，從而導致現在主義的陷阱，讓人不自覺地以西方現代性隱涵的真理與價值標準評判一切（Hunt, 2007: 85-86）。因此，我們不只要超越歐洲或西方中心主義，同時也必須超越現代中心主義（Bentley, 2006）。

### 三、世紀末的轉折：美國崛起、西方的發明與對東亞的矛盾情懷

如果我們跳出習而不察的歐洲中心觀點，改從世界史的全球觀點來看，我們將發現到，即便在所謂歐亞大分流後的 19 世紀，牽涉到的仍是場與時間的競賽。如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歷史所見證的，亞非國家仍有可能及早透過自強爭取到與西方近乎平起平坐的地位（Darwin, 2008: Ch. 5）。同樣地，如果我們拿下長期戴著而不自覺的中國中心眼鏡，不再只從帝國主義侵略的角度解讀明末以來中國與西方的互動，而是也看到帝國碰撞的事實，<sup>4</sup> 將認知到，以往清朝被認做遲緩、顛預的反應和作為，實受其重西北內陸、輕東南沿海的一貫戰略思維，<sup>5</sup> 以及少數統治下以抓牢政權為第一優先的考慮所影響。即便如此，中日甲午戰前，多數國際觀察家仍認為中國較有優勢。帝國遺緒固然拖累了中國現代化的步伐，但中國能擺脫如奧斯曼帝國般崩解的命運，在歷經軍閥割據等分裂狀態後仍能復歸統一，卻得歸功於同一遺產。儘管西方列強常把東亞描述為「無政府的」狀態，但實際面對擁有悠久國家傳統的東亞時，他們不敢掉以輕心，因為他們深

4 舊有的「衝擊—回應」說雖早遭拋棄，但台海兩岸仍常奉歐洲為中心，視 1842 年的鴉片戰爭為中國「現代史」的起點——儘管歐洲人未必重視此事件或如此看。其實，在清廷眼裡，到 1860 年代，列強的危害不過是「肘腋之憂」、「肢體之患」，太平天國、捻軍等內亂才是要命的「心腹之害」。真正令大清朝野震動的，是甲午敗於日本。但要到義和團事件，剝下清廷僅存的正當性，令改革派也投向革命，滿清才終於傾覆。幾十年的蹉跎，決定了中、日發展的殊途。

5 帝制末期中國的海外貿易其實一直很蓬勃，絕非待洋人以槍砲叩關後，才被不平等條約強行打開。一如我們常誤以為台灣要到 1860 年開港後才與世界連結，以往流行的歷史敘事塑造出來的理解，常是錯的或至少片面的。

知，要入侵得付出較征服美洲、南亞及東南亞更多的代價。

## （一）百年和平神話背後的帝國年代

因此，所謂「百年和平」或「19世紀和平」雖是個歐洲中心的神話（朱元鴻，2014），但也揭露了，透過拿破崙戰爭後的維也納和議，歐洲列強取得某種權力平衡，不再像以往般頻繁互耗，而得以把心力放在對外侵略上。尤值注意的是，「西方」的概念與認同這時被發明出來（如見 Bonnett, 2004; Browning and Lehti eds., 2010; Darwin, 2008: Ch. 5），<sup>6</sup> 把快速崛起的美國與不斷東進擴張的俄羅斯涵括進「大歐洲」中，<sup>7</sup> 從而創造出 Hobsbawm 所謂「帝國年代」的帝國主義高峰期。

前歐洲殖民地美國的崛起，格外值得留意。以往多認為要到1898年美西戰爭，美國才加入帝國主義競逐的舞台，而低估了美國作為歐洲帝國主義得以擴張的幕後推手的重要角色。美國不但以遼闊

---

<sup>6</sup> 傳統歷史敘事常受歐洲中心觀影響，以事後的建構證成，具有或等同於「西方」意涵的「歐洲」誕生於10世紀甚或5世紀。雖然古代就有「西方」與「歐洲」兩個詞彙，但它們未取得過特定的認同地位，更不曾疊合。對古希臘人來說，文明與野蠻的界限係落在希臘與非希臘間。對以地中海互相連結，側重航海的古代文明來說，南北區別遠比東西對立重要。直到15世紀晚期，歐洲主要仍是個地理觀念，附屬於作為主流認同體系的基督教世界。歐洲起源於古希臘，是19世紀初才有的建構，恰與此處所言的發明西方約略同時。

<sup>7</sup> 西方概念與認同的建構，涉及內、外諸多面向的複雜過程。就西歐內部而言，勞工與女性一開始並未包括在內。就對外來說，在涵括美國與俄羅斯時，又需與其他地區或文明區隔。有趣但不難理解的是，非西方的知識分子不但積極參與「西方」的建構，還常率先如此做。西方認同的流行，某程度可說是處於邊陲的俄羅斯打造自我認同的附帶產品。

的「無主」土地吸納歐洲龐大的移民人口，紓解其日益惡化的人地比，更以低廉的成本創造出蓬勃的大西洋貿易，在協助歐洲致富的同時，又未消耗它太多資本。美國的工業產量 1830 年代便已超過法國，僅次於英國，而和比利時、瑞士並列世界第二。故此後不斷有人談及美國的崛起，托克維爾、宋巴特、韋伯等古典大師也對此新興國度表現出高度興趣，紛紛撰文討論。到 19、20 世紀之交，美國更躍居全球最大經濟體。儘管如此，由於反抗帝國的殖民傳統等因素影響，中央集權的行政體系與可派赴海外的軍事力量，發展的相對晚，而海軍又較陸軍順利些。要到邁入 20 世紀，屢屢在危機刺激下，國家力量才大幅擴張，特別是經兩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才拋棄長期採行的孤立主義政策，憑經濟實力躋身軍事強國，開始以商業、消費、娛樂及流行文化影響世界各地（如見 Ernst, 2014; Higgs, 2006）。

## （二）尚不敢僭稱世界文明史的西方文明史

隨著西方認同的發明，開始有「西方文明史」的教科書與課程出現，此一稱呼習慣一直延續到二次世界大戰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文明史多半以歐洲史為基礎，並往往再擴大改寫成世界史。例如，Hayes 在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1932) 的基礎上，便分別出過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since 1500* (Hayes, Baldwin and Cole 1962) 與 *World History* (Hayes, Moon and Wayland, 1955/1932)。不過，就如 Morris (2010: 22-23) 自承的，在他求學及初任教職的 1970、1980 年代，學的及講的都還是西方文明史。換言之，這時西方人尚不敢以全世界自居。因為隨著前述確定性的喪失、各式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特別是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讓歐洲人嚐到

既是歷史繁華的高峰，同時卻也是衰敗開始的苦痛經驗，不少人對歐洲或西方文明其實充滿懷疑。史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及晚些湯恩比的《歷史研究》，便誕生於這樣的時代氛圍。在對西方文明感到失望乃至絕望時，東方文明常相應被吹捧為可提供出路的思想資源。因此，雖然現代性概念這時已開始普及，但獨尊西方文明的現代性論述還難以成形。

很能說明當時知識氛圍的是，Hayes et al. (1955/1932) 的世界史教科書雖依循古代、中世紀、現代的三分架構，但接著敘述的是「歐洲的擴張」，不但談到「今日文明的革命基礎」與「白人的負擔」，還探討了「試煉中的現代文明」。作者們顯然對西方與現代文明充滿憂慮，而非自信滿滿。若我們了解 Hayes 曾探討過「物質主義的世代」、「現代民族主義的歷史演進」與「民族主義作為宗教」等議題，當不會對此感到訝異。這清楚顯示，人們對「現代」與「現代文明」的感知，是不斷隨時代氛圍波動的。

### （三）當時社會學文獻反映出的西方優越感、傍惶與對東亞的關注

當我用現代性為關鍵詞，對 JSTOR 資料庫進行全文檢索，也發現類似的現象，更意外看到當時英語世界高度關心東亞現代化的問題。在不限定條件的情況下，1920 年前，用過現代性一詞的文獻有 422 筆，惟似多來自文學與藝術圈。我隨機抽樣了幾篇文章閱讀，得到個有趣但待進一步研究確證的印象。有的文章固強調現代性的當代意涵，但質疑現代性獨屬於當代西方者亦不在少數。有作者便指出，人們雖有理由對今日的現代性感到驕傲，但昨天的現代性亦非徒然，

我們所嘲笑的野蠻人不但自認現代，還可能是藝術上的先行者。有人更具體以畢加索受原始非洲的黑人啟發為例，指出現代性與進步的藝術的界限其實是模糊的。

加上社會學的學科限定條件後，在 1920 年以前，僅能找到六例，且無一以現代性為標題。除一篇曾提到兩次外，其他皆只在行文時偶一提及。這清楚顯示，對 1920 年以前的美國社會學家來說，現代性並非關鍵的問題意識。原因之一或在於，他們對「現代性」的理解基本上與「現代」無異，也就是把現代性當「形容詞」用，常提及或稱讚如治理或經營方式、表達、操作定義、材料、書、新聞……的現代性。較有趣且值得注意的是，Laidlaw (1911) 提及福音與先知皆具有「現代性」，雖正面評價現代性，但不採取古今截然斷裂的觀點。Barnes (1917) 則稱許 Marsiglio 的著作是中世紀裡最為現代及原創的作品，秉持著類似伏爾泰的精神與「現代性」，對教會展開攻擊。顯示不論支持或反對教會，時人對「現代性」一詞的理解某個意義上是一樣的。

更引人注意的是，Thomas (1908: 738) 提到，「從中國的觀點來看，我們是霸凌值得尊敬的古老民族的暴發戶」，相對地，「日本在戰鬥的一面，有著類似歐洲的歷史。她有相同的封建制度……武士道系統……幾乎與我們一樣年輕……她的現代性讓她能看出我們的科學與火器的優點」。這顯示，當西方日益以現代性為傲，並以此來區辨自己與其他國家、地區或文明的差異時，也開始留意他者的追趕，既期待他者變得像自己一樣，又擔心他者真的追上——儘管這時現代性的用法仍舊較像無特定內容的形容詞。

當年限放寬到 1945 年，也只有 46 筆社會學文獻曾用過現代性一

詞，<sup>8</sup>且依然沒有任何一篇論文以此為標題，基本上多數還是把現代性當形容詞用。不過，內容上開始有些接近日後西方中心主義通俗版本的論點出現。有文章便稱許克里特島文明有著璀璨的現代性，凸顯出西方現代性的發展係長期累積而來。同時，「不止息」(restless) 成為與現代性緊密連結的意像。White (1925: 1) 更明確述及，「位於歐洲與西半球以及西方海中特定島嶼的我們，以我們的現代性為傲。或許我們的驕傲太過依賴於我們如此普遍使用的現代機器，以致於我們很容易遺忘，將我們與黑皮膚的兄弟們分別開來的，是利用機械的普遍性，而不是單純運用機器而已……我們將機器的好處擴散得如此之廣，以平等的方式將它的利益與所有能進到我們的現代文明之中的人分享，主要是因為西方世界的我們充滿了民主的理念，廣泛地來說，這個理念也就是基督教的教義」。相對流行的歷史敘事常以文藝復興或宗教改革啟動的「世俗化」，即擺脫教會的掌控為現代的起點，這似是個矛盾。但在日後的論述裡，偏好把現代性的誕生與西方的勝出歸功於基督教的獨特傳統者，實不在少數（如 Duchesne, 2012; Stark, 2014）。

值得注意的是，當西方日益明確以現代性為傲時，慢慢也開始有人論題化現代性的負面效應。Lippmann (1929) 在 *A Preface to Morals* 一書裡便曾以「現代性的迷幻藥」為章節名，此後似一定程度成為流行的套語，至少兩篇分別討論老人照護以及印度種姓制度的文章，都援用了同一修辭。

更重要的是幾篇將目光投向西方之外的「他者」的文章，有人討論現代思想對印度的影響，也有文章在分析墨西哥的教會與國家的關

---

<sup>8</sup> 實際上僅 44 筆，因兩筆是 back matter，另近半是書評，嚴格意義下的期刊文章僅 25 筆。

係時，將現代性的象徵與過去的象徵對舉。如果把包含有「現代化」一詞的文獻也納入，例子就更多了。而且，一篇 1912 年討論滿洲問題的文章，便已觸及了中國現代化的議題。

同樣顯著的是，美國的社會學家不但更常在討論他者時用到「現代」與「現代化」，且特別關注東亞的發展。扣掉談西方本身的文獻，除少數談到蘇俄及中東歐外，主要都跟亞洲有關。有一、兩篇是談土耳其與印度，更多是談日本，但最多其實是討論中國的現代化問題。MacNair（1941）從反對自由主義、民主的潮流以及思想的現代性等脈絡來分析日本轉向軍事法西斯的書評，清楚顯示出時人對東亞的關心，除法西斯的時代背景外，背後還涉及愛恨交織的矛盾情懷：他者的改造與追趕。

此外，會用現代化一詞的社會學論文，討論的主題常跟「人口」有關，但更多的是「鐵路」，討論了包括美國、法國、俄國、印度與中國在內的鐵路問題。對亞洲的關注，依然相當顯著。鐵路會成為偏好的主題，不令人訝異，因正是它帶來交通與運輸上的變革，令人可在短時間內做遠距的空間移動，帶來「時空壓縮」的效果，可謂現代的經典象徵。

值得深思的是，西方這時為何格外留意現代性與現代化在東亞的發展。如果我們不再被西方自始勝出的神話迷住，而是細心重新審視當時的世界大勢，那麼便不會對西方特別著緊東亞感到奇怪。除了東亞是西方尚未入侵的最後一塊淨土，常被形容為「無主荒地」（no man's land）的因素外，這無疑也跟東亞自有國家統治傳統，能相對有效地動員人民抵禦外侮有關。例如，首倡海權說的馬漢，1900 年便探討過所謂的「亞洲問題」。在視美國的擴張為歐洲文明發展的片段此前提下，他試圖在陸權的俄國與海權的英國於亞洲爭霸的情況

下，籌謀對美國最有利的作為。他特別提到，在此特定區域採取行動時，對所涉地區人口的考慮應優先於對任一外來國家利益的考慮，並馬上說這並非是獲取利益的掩飾或借口。因為，他強調，是既有政府效率不彰才造成此區域的不安定，而居民的利益不必然與現政府或其繼任者一致。他接著說國家分裂是極可能的發展，但強調這種瓜分利益的做法不符美國的傳統，故應致力於創造某種權力平衡（馬漢，李少彥等譯，2013/1890，頁 494-495）。

西方強權間的微妙平衡，很快被日俄戰爭（1904-1905）打破。戰爭爆發前，馬漢便認為日本加入歐洲大家庭的行為正體現該國的優秀品質，應接受其為歐洲大家庭的一員，否則即將到來的大災難，將迫使歐洲文明國家認清它們在亞洲的一致利益（馬漢，李少彥等譯，2013/1890，頁 515）。從傳統歐洲中心的敘事角度來看，日俄戰爭似不過帝國擴張下，幾必然會發生的殖民衝突插曲，無足輕重。但換個視角，這場東亞的小日本打敗傳統歐陸強權的大俄國的戰爭，便頗有資格稱做「第零次世界大戰」（如見 Steinberg et al. eds., 2005）。這不單因日、俄分屬亞、歐，而戰爭卻是在中、韓及鄰近水域開打，並主要由第三造資助，牽扯眾多，同時也因為鐵路與汽船等新科技裝備的投入，與「總體戰」等新軍事理論的應用，更因電報與廣播的運用而變成近乎全球同步關注的大事件。

若非不到十年便發生規模更大，並深刻地改變了歐洲與整個世界面貌的「歐戰」，同時俄、日卻分別發生革命及在二戰中戰敗，以致日俄戰爭在政治正確的影響下泰半被遺忘，今天我們對它的重要性的評價極可能不同。無論如何，儘管阻止俄國擴張的，的確是它本身的革命而非日俄戰爭，但戰爭以及尤其是戰敗的結果，無疑大幅提高了革命成功的機率。更重要的，就算俄國未以全力與日作戰，但這

場原不足以改變整體戰略形勢的單場戰役，卻會促成自我實現的預言，<sup>9</sup> 以致實質影響了歐洲內部的權力均衡以及歐亞均勢，令西方列強再難阻擋東亞勢力的上升。所以，這時英語世界會關心東亞現代化的問題，不足為怪。

#### （四）伴隨現代性而來的黑暗面也是它不可分的一環

正如前面提過的，現代性最初的意涵是過渡、短暫與偶然，意味著改變的制度化與常態化。社會生活全面的加速固然帶來了進步與繁榮，同時卻也帶來失落與悵惶，就像一列不斷加速，卻茫不知駛向何方的火車。就此而言，歐戰後成立，本身體現為「古典現代性」危機的威瑪德國，具體而微地彰顯了當時歐洲文明的普遍危機。首先，廣義的自由主義雖漸取得上風，不但正當化了民族國家的成立，同時也助長了帝國主義與大歐洲的擴張，但放任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治理術，卻也造成各種問題，不但促成各種政治抗議與社會運動，更埋下形形色色革命的火藥。其次，隨著理性主義與歷史主義的相繼破產，歐洲人更陷入主體性危機的文化危機—對知識分子尤然。最後，在現實上，隨著大眾社會與群眾政治的到來，在民族主義、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間，產生了持續而劇烈的鬥爭。於是，在同時混雜著希望與絕望的情況下，人們不斷在墮落與革命間擺盪（如見 Peukert, 1992）。

---

<sup>9</sup> 這個影響是多方面的，不單涉及其他列強對俄、日國力走向的判斷，也令東亞諸國及其他地方的弱小國家指望可以日為師。事實上，不只甘地、蘇卡托等後來形塑東亞歷史走向的人物受此戰役影響，就是希特勒的世界觀也深受此戰所形塑。

當時歐洲人對自身的文明都充滿懷疑，難怪這時現代性不會是流行的社會學概念。重要的是，儘管時人未必把這些負面發展看作現代性的內容，或甚至看作是現代性的對立面；但站在今日的視角，不論我們把這視為黑暗面也罷，看成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指導下的資本主義或自由民主體制競爭的變異也罷，須認知到它們同為現代性的一環。惟有當我們一併掌握到變異與負面發展，掌握到通往現代性的不同途徑與軌跡，才真正掌握到現代性的完整面貌，而不能依著主流現代性論述只看到成王敗寇的單一軸線。

對活在 20 世紀前半葉的美國社會學家來說，留意不同發展模式間的差異與優劣，正是他們的時代課題。資料顯示，比起現代性來說，他們更常用現代化一詞。雖然 1920 年以前，收錄在 jstor 資料庫中提及現代化一詞的社會學文獻也只有 10 筆，但從 1920 到 1945 年間，便增加到 114 筆，1945 到 1960 年間更迅速增長為 322 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論文的知識關懷與提問方式，已隱約透露出戰後美國社會學發展的動向。像有篇論文的主旨便在討論工業進步的模式，而晚些，在二次大戰何時方可結束仍不確定的情況下，就已有論文針對戰後規劃的機制預做知識準備。

## 四、二戰後的發展：從現代化論、後現代性的挑戰到不斷改寫的現代性

### （一）冷戰競逐下現代化理論的流行

雖然戰前已出現了現代化的提問，但現代化的問題意識及現代化理論的流行，終是二次大戰以後的事。這不只反映出美國慢慢取代英、法等歐洲舊霸權，以及逐漸形成美、蘇兩極對抗的世界局勢，同時也反映了美國的社會科學隨其政經勢力日益取得知識上的領導。二戰結束不久，Levy 在討論「現代中國的家庭革命」時，便明確使用了現代化的概念，將傳統與現代對照，但基本上是把現代化等同於工業化，尚不包括經濟以外其他方面的內涵。一直要到 1950 年代，人們才開始廣泛用「現代化」一詞來描述所謂從傳統到現代的鉅變，將其比擬為如同從狩獵採集演進到定居農業文明社會般的千古之變（Gilman, 2003: 24）。隨著冷戰格局形成，爭取後殖民國家與第三世界支持，變成美、蘇角力的關鍵。現代化的理論與論述因此相應而生，其推廣與流行更與冷戰下的心理戰、宣傳戰緊密相關，就是行為科學的發明也都可歸為「文化冷戰」的一環，從而也助長了「冷戰文化」的形成（Gilman, 2003; Shah, 2011）。

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的時代背景下，兩位俄國出身的經濟學家成為現代化論述的指標人物，不令人意外。Rostow（1960）便明白打出「非共產黨宣言」的旗號，其階段論的論述方式，清楚反映出歐洲中心論指引下的單一線性演化模式。對決定論與線性發展模式有更高警覺的 Gershenkron（1962）則以「經濟落後的歷史透視」為名，闡述愈是落後的國家愈可能導致政府強力介入經濟活動，而它們

的工業化過程必不同於先進國家。主張線性演化論的現代化理論會流行，固有與共產集團展開象徵鬥爭的需要，但也反映美國及其同盟在大戰中獲勝，以及歐美從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恢復而日益增強的自信，特別是美國獨特的民族主義發展軌跡影響下，領導世界的企圖心（Fousek, 2000）。

由於這樣的背景，現代化理論關注的對象主要是第三世界，而非研究歐美或西方社會本身的現代化歷程，歷史書寫及推崇的榜樣往往從歐洲的過去直接跳接到美國的現在（Gilman, 2003: Ch. 2）。換句話說，美國政府及其知識分子關心的是如何將西方的成功模式推廣、擴散到發展中或低度發展地區，以遏止共產主義在亞洲、非洲及中東的擴散，重點在如何令所謂落後地區經由現代化向西方看齊，實際上是把現代性當預設，而非有待研討的議題。

這清楚反映在 Lerner（1958）對社會學來說更具代表性，可謂現代化理論開山之作的標題上：*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不同於 Rostow 基本上仍以關注經濟面向為主，或 Gerschenkron 雖考慮了國家的介入，但並未探討政治本身的發展，Lerner 毋寧更著重政治、文化及價值的面向，提出一系列可追溯到 Parsons 模式變項的二分，來對比傳統與現代。受到社會學日益成熟的現代化論述影響後，Rostow（1975）後來才把政治也納為核心考察的面向。

然而，以現代化作為解決第三世界發展問題的處方，與其說是透過廣泛、紮實的經驗研究得出的結論，不如說是理論推導的結果，不過提供了一種特定視角下的現代性界定，逕自認定這可作為前殖民地與所謂落後地區脫貧脫困的解方。儘管現代化理論依然認為殖民地在文化上較為落後，但它揚棄了以往與殖民論述緊密連結的、生物學的

種族差異本質論。這相當程度受到美國本身種族平等爭議影響，導致許多美國學者支持殖民地自決與獨立。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下，為達成富強的理想及追趕西方，剛脫離殖民的第三世界本土精英多半傾向積極回應、熱烈擁抱現代化這個取代殖民的觀念。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銳意改革土耳其，促成「現代化」一詞流行開來，日後獲國會頒贈「土耳其人之父」為姓的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在臺灣，我們同樣看到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一書的不斷再版，可見從戰後到 1960 年代中期，現代化不論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幾乎皆是不受質疑的理想（Gilman, 2003: 1, 30; Shah, 2011: 23）。

## （二）歐美間非同步的政、經、軍與文化的霸權交替

儘管現代化理論看似為美國在世界上掙得了解釋的霸權，歐、美新舊霸權的交替實際上卻非一帆風順，各個領域的情況與步調更是有異。美國的霸權並非如現今很多人想當然耳地認定，在二次大戰後一夕間成立。其得以躋身霸權的地位，跟戰後東亞的復興與崛起，從而得以成為冷戰裡以美國為首的自由陣營用來宣傳的成功樣板，緊密相關。

如前述，美國的崛起有個漫長的過程，儘管在 20 世紀初，美國已是數一數二的經濟強權，常備軍卻不過十多萬。是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刺激與需要後，美國才慢慢變成貨真價實的軍事大國。尤其，光美國的安全繫於歐洲乃至歐亞權力均衡等地緣政治的理由，不足以令其拋棄長久採行的孤立主義。是經過從二戰前便開始的一番說服公眾的長期努力，美國才慢慢願意乃至樂於在國際上承擔起政治角色與責任，從世界秩序的旁觀者漸漸轉變為參與者，乃至積極以領導者與規

劃者自任，將環繞著民主、自由、開放、富足等觀念的美式現代性行銷全世界（Maier, 2006）。

然而，就像新富與舊貴擁有不同的資本，其地位升降並非立刻的全面取代一般，二戰後的美國在軍事與經濟上雖強大，但在政治以及尤其是文化上，仍無法自居於英、法（乃至戰敗的德國）等歐洲舊有大國的領導。攸關歐洲復興動力的馬歇爾計畫，若非採取尊重歐洲國家自主性的做法，根本就無法運作。之所以如此，除了歐洲本就是西方文明的根源地，美國不過是由此分出的殖民開拓者，歷史與文化積累為時尚短，政治資歷仍淺外，更關鍵的是，殖民地解放後成立的國家，在政、經、文化各方面都仍與舊宗主國有著千絲萬縷，不可能突然全數斬斷的關係，故歐洲保有相當的影響力。

雖然自 1920 年代起，美式消費與流行文化便開始在世界各地散播，特別是在廣播、電影、電視等新式電子傳播媒介的幫助下，取得日益大的影響力與日益深的穿透力，乃至在西方文明故地的歐洲造成一波又一波的「美國化」，並相應引發一次又一次的「反美國化」運動。<sup>10</sup> 但是，在 1980 年代以前，美國不曾贏得界定世界的文化霸權，美式生活方式所代表的現代性及其論述，更常與物質生活有關，像冰箱、洗衣機等家電，汽車，速食，以及特別是傳遞美式現代文明生活意象與內容的廣播與電視（如見 Gassert, 2012; Oldenziel and Zachmann eds., 2009）。<sup>11</sup>

從歐洲有關美國化的辯論演變，我們可一窺美國的文化霸權是

---

<sup>10</sup> 有趣的是，戰後歐洲的整合與美國化相當程度上是一體的兩面，而儘管美國化同時會激發出反美的聲浪，但這卻常有助於而非有害於歐洲的整合與認同的形成。

<sup>11</sup> 1920 年代雖已出現消費主義，但消費文化變成可扣連到身分政治與日常生活，改變其與現代性的關係，是 1960 年代文化變革後的結果。

如何打造出來的。從 1898 年美國打贏美西戰爭，開始對菲律賓殖民統治以來，便有歐洲觀察家指認「美國的挑戰」，視其為無限機會之地。到 1920 年代，隨著美國的電影、音樂與汽車成功征服歐洲，遂出現關於美國化的爭辯。歐洲人在著迷於福特主義生產奇蹟的同時，也對美國的經濟滲透，以及以好萊塢電影與爵士樂為代表的文化滲透感到憂慮，更不滿於美國在國際政治上的袖手旁觀。對一戰戰敗的德國來說，其觀感尤其受美國向英法同盟傾斜影響。到二次大戰後，抵制的聲浪開始變強，因這時是隨著美國佔領德國，創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在歐駐軍，推動經濟復興計畫等而來的，帶有強烈宣傳意味的，由上而下的美國化。擔心遭美國宰制，喪失國家自主性與主動性，使得對美國化反感成為普遍現象，知識精英尤然，因在其眼裡，美國不但經濟上掠奪成性，文化上也粗俗蒙昧。1960 年代，因越戰及年輕世代的反叛運動，更出現過一波反美的高潮。但同時，自發採用美國產品、制度、價值等由下而上的美國化卻也不曾中斷。隨著大眾消費社會日趨成熟，美國的影響力更愈來愈大，特別在年輕世代間。到 1970 年代，隨著因改採浮動匯率制加上石油危機而來的停滯性通貨膨脹的到來，又適逢從製造業為主向服務業為主的結構調整，以致物價與失業率雙雙飆高，造成社會動盪不安，對戰後達成的富裕與持續的經濟成長投下陰影，由下而上的美國化才告暫時退潮（Gassert, 2012）。

1970 年代正是關鍵的轉折期，在東亞，美中關係開始活絡，冷戰趨緩，對歐洲來說，更可謂舊歐洲的終結。歐洲在二次大戰後立刻因美蘇對抗而被捲入冷戰的集團對峙，故二戰所以發生及造成的後果，實際上都未得到清理。在與共產主義競爭及鬥爭的表面下，戰後初期更重要的公約數毋寧是反法西斯。以國家介入解決社會問題的

福利國家，於是誕生。然而，經過 1960 年代社會運動的狂飆，加上邁入 1970 年代後經濟遭逢危機，戰後行之有年的以增加公共支出刺激消費的凱因斯政策失效，加上政客紛紛學會卸責於國際環境與協定後，人們開始質疑國家角色的過度擴張，乃至討論起「無法治理」的危機。在國際上，希望走出自主道路的法國，帶頭挑戰二戰後試圖穩定貨幣秩序的金本位制度，不料最後反而促成美元因其獨有的國際通貨優勢而得享更為穩定而全面的霸權（Fields, 2015）。同時，美國也改變自己原有的經濟體制，從福特主義轉向彈性生產體制，並積極推動區域整合機制與更廣泛的金融自由化。不只如此，美國更以市場至上的經濟自由化為底蘊，搭配自由、民主、開放等價值理念，藉影響力無遠弗屆的娛樂流行文化，將美國版的現代性，自由民主體制下的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推銷。隨著歐洲政經實力因經濟危機而趨於下降，同時美國卻漸漸發展出自身的文化優越感，到 1980 年代，美國便慢慢攘奪了界定世界秩序為何的文化霸權。到前共產集團解體，冷戰正式結束，美式文化與生活駸駸然成為主流的現代性想像（Amadae, 2003; Germann, 2011）。

如果 19 世紀西方概念的發明是歐洲為了把美國與俄國納入，那麼到 20 世紀中後期，變成是美國希望用西方的認同來框住歐洲。在戰後初期西歐的脈絡裡，西化基本上與美國化同義，係用來強化大西洋同盟的概念。然而，對戰敗卻又只能選擇與美同盟的德國來說，要認同「西方」卻不免多有猶豫與遲疑，畢竟西化像個帶有進步史觀的詞彙，提醒它得克服自己不光榮的法西斯過去，走向美式的自由民主體制。隨著歐洲整合程度的增加，西化才漸漸蛻下美國化的指涉，而更常指歐洲化。也因此，在戰後歐洲的脈絡裡，西化既是個較美國化來得廣的概念，卻又是個更特定的概念（Gassert, 2012）。隨著美國繼

政經霸權後也奪得文化霸權，歐洲更願意認同西方而非美國。相對地，以前殖民地為主的第三世界，則出現了從反對西方／歐洲到反對西方／美國的轉折，並為早就有的反美注入反全球化與拒絕美式世界秩序等新的面貌。在經歷九一一恐怖攻擊，及美國隨後發動的諸多反恐作為後，對許多歐洲知識分子來說，反美更取代以前的反共，成為意識形態上的定錨點。正是在冷戰形將結束之際，突然湧現討論現代性的熱潮，對美國模式的不滿，是個不宜忽略的重要背景（Browning and Lehti eds., 2010）。

### （三）歷史社會學轉折的意外後果

就在現代化理論的地位如日中天時，隨著 1960 年代末期世界政治局勢的演變與西方社會內部的發展，特別是民權、性別與學生等各種反叛運動的興起，歐洲思潮又再次被引入美國，令以往具支配性的現代化理論與結構功能論加快沒落的趨勢。代之而起的新理論進路，或者重衝突的面向，或強調微觀的進路，或關注分析意義的問題，現代性這個牽涉到現代社會根本性質的大議題，基本上乏人問津。不過，為校正現代化理論單一線性演化觀的不當預設，另覓理論基礎與現實出路，不少社會學家開始投入歷史研究。由此形成一股歷史社會學的研究風潮，像 Thompson 致力弄清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Moore 則研究起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起源，Bendix 探討了民族建立與公民權的關係，Anderson 則爬梳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Tilly 討論西歐民族國家的打造與從動員到革命的過程，Skocpol 則比較法國、俄國與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革命的關係。他們雖不曾把現代性當重要概念，也缺欠此問題意識，但一定程度可說都在回應現代性的問題。

當歐美學者為改正現代化理論的缺失，而把目光轉向歷史，從而轉回對西方自身進行研究時，卻產生一個始料未及的後果：他們或者很少考察非西方地區，或者雖進行了比較，結果卻更像對照，只凸顯了西方的成功案例與獨特軌跡，以致最後的成果聚焦於西方的現代社會形成史，進而導致一般逕視此為現代世界史的核心，不過是換了種新的形式繼續鞏固歐洲中心論（Dussel, 2002），更成了日後可用來捍衛歐洲中心的主流現代性論述的堅定基石。就是深具反身性意識，對歐洲的殖民剝削展開批判，主張以整個世界為分析單位的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說，或是強調後殖民視角的 Blaut（1993），都還是認定歐洲自 1500 年左右與世界其他地區接觸以來，便一直擁有優勢，以致一定程度上都是 Blaut 自己批評的「殖民者的世界模型」。到 1980 年代晚期，在歷史社會學透過以向自然科學看齊、看似嚴謹的比較法，成功正當化自己的分支領域地位，同時卻也被馴化為常態研究後，就更缺理論野心與反省深度了。

結果，由於歷史社會學常是大尺度的宏觀研究，我們遂常看到以既有歐洲中心的現代性想像為研究據以出發的預設，卻將其誤認或偽裝成研究的結論的情況。以 Baechler et al. eds.（1988）討論「歐洲與資本主義興起」的關係這本標準教材為例，雖已擺脫古典社會學的某些預設，走出「從封建到資本主義」的傳統簡化二分模式，但仍不脫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歷史研究往往只是用來強化歐洲一路領先的佐證。像 Mann 雖致力發展一套細緻而複雜的「社會權力的來源」的理論，但當他在本書以精簡的方式探討資本主義何以只在歐洲誕生，提出所謂歷史的解釋時，不但強調「不止息」是中世紀文化的特徵，更把歐、亞不同的發展軌跡歸結於集約的（intensive）相對於粗放的（extensive）權力與技術的差異，主張自西元 1000 年起，歐洲

的農業、技術發展與社會結構便已建立這樣的特色，雖然實際的歷史發展不乏意外與巧合，但基本模式很早便確立，言下之意西方的勝出早已預定。

至於旨在從比較的進路解釋為何工業化最早在歐洲誕生的 Hall，在歐洲的部分，基本上把 Mann 描述的，在基督教會提供的規範上的綏靖大傘下，自羅馬帝國滅亡後發展出來的無首領但集約的農業文明當背景，強調政治上的碎裂是市場得以自主發展的必要條件，同時議會對政府的限制最終反而在社會中創造出總量更大的權力，而彼此競爭的國家則鼓勵了資本主義的勝利。如此描繪歐洲的特色，一定程度上可接受，但因整個行文沒有明確的年代標示，極易給人資本主義在歐洲誕生係結構上必然的印象，不像 Mann 還給偶然一些角色。當 Hall 比較其他文明如中國時，在無法充分掌握相關知識背景的情況下，很容易受歐洲中心觀支配而不自知。他雖用官僚人數甚少來駁斥 Wittfogel 東方專制主義的刻板印象，同時卻堅持疆土如此遼闊的帝國勢必要以軍事力量來創造及維持，文化是被動與次要的，無論如何不可能大過國家，而渾然不覺這兩個敘述所傳達的意象彼此矛盾。

相較〈現代性的源頭〉此標題給人的肯定期待，Baechler 實際行文時相當保留，坦承並未解答現代性之謎，不過從形態發生的觀點，藉比較種姓與封建，以更精確的詞彙來提問。但在最後結論時，Baechler 卻在前面毫無討論的情況下逕自斷言，歐洲經濟的發展可歸結於財產權、受到規制的市場以及不斷藉結合新的生產要素尋找獲利機會的企業家三個一般性的條件，並很快推論說，經濟的進步得仰賴民主的政治體制，顯示出依然以歐洲經驗為量尺的偏見。他自己也明說，日本是唯一在一、兩代內令自己現代化的國度，故納為比較對象，但又擔心有太過平行的危險，才又選了印度作為對照，清楚反映

東亞的追趕是歐美反省自己過去的關鍵動力之一。

企圖弄清歷史真實過程的歷史社會學研究，未意圖地成為歐洲中心主義的同謀，原因常在於，史料不免零碎片斷，當研究者面對欠缺資料的關鍵空白時，往往會不自覺地受自己的既有史觀或信念影響，以之填補空白，好讓故事得以完整。Studer（2015: 7）在回顧過往研究時便發現，由於量化資料零散且意涵不清，留下很大的操弄空間，所以關於貿易擴張與市場整合對於歐洲興起究竟有無作用，竟可得出全然相反的結論。然而，這畢竟還是在歐洲興起的大框架內的爭論。如 Blaut（1993: 9, 59, 130-131）指出的，歐洲中心論並非素樸的我族中心態度，而是建立在眾多歷史事實的基礎上，也因此更易令人信以為真，而根本不曾去想這副眼鏡有無盲點。例如，當 17 世紀以前的人口資料無法決定性地證實歐洲人晚婚、結婚率低，即存在藉婚姻與繼承制度對生育進行控制的「歐洲家庭模式」時，學者便逕自與 20 世紀非歐洲地區的家庭比較，視其等同於前現代歐洲的家庭模式，藉此「證明」真有所謂現代歐洲家庭模式。結果，個別的命題與敘述或會被駁倒、改寫，但整套歐洲中心史觀的論述卻不太受影響，以致迄今依然穩固。像 Landes（1998: Ch. 2）便繼續沿用歐洲家庭模式的觀念作為證成歐洲優越的原因之一。其實，所有研究者都知道，在面對必然零散的史料時，推估勢不可免，但很少研究者真能反身性地審視、批判自己的推估，而往往是根據自己先在的信念接受或拒絕特定的推估，並在論證時把推估當事實，以致像對工業革命階段的英國經濟成長率或煤業成長率的判斷可有數倍之差。這不單是因為研究者採大膽或保守估計所致，也源自習於以全國規模來推估，忽略地區與部門的差異性可能極大。

#### （四）伴隨東亞崛起而反覆出現的西方優越論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元先後爆發過數次危機，其根源來自美國主導下建立的黃金匯兌本位制。傳統上認為這是美國得以享有及維持全球霸權的重要基礎，但這種調控國際貨幣匯兌的方式事實上造成許多混亂，而美國雖得以仰賴歐洲盟國與日本的融資，以財政赤字的方式繼續維持繁榮與霸權，卻也因國際收支失衡漸成外強中乾、脆弱的霸權。

隨著法國希望降低美國的影響力，減少其美元儲備，而越戰的支出又造成沈重的財政負擔，逼得美國總統尼克森 1971 年宣佈終此一體制。接踵而至的兩次石油危機，更重擊美國的經濟發展，令西方國家的經濟成長率普遍衰退。相對地，自 1960 年代以來，所謂「新興工業國家」不但經濟成長迅速，貧富差距也未隨之惡化。以日本為首的東亞諸國的表現尤其亮眼，到 1970 年代末不但開始吸引歐美學者、政客與大眾的注意，並日益令美國及西方在面對東亞時產生愛恨交織的矛盾心態，一方面視之為模仿西式現代化的成功榜樣，另一方面卻也開始擔心它們造成威脅甚或超越。從「日本第一」的聳動標題，到亞洲「四小龍」或「四小虎」及「東亞資本主義」或「儒家資本主義」等標籤的流行，以迄世界銀行研究「亞洲經濟奇蹟」並提出報告，反映的正是 Amsden (2001) 的標題點出的，西方非常關心世界其他地區崛起後對它構成的挑戰。相對於西方學者常踵繼 Gerschenkron 的視野，以「發展型國家」理論來解釋東亞諸國的成功，強調政府對市場的治理，或擁有所謂的鑲嵌自主性，不少東亞在地學者則傾向從民間的視角出發，凸顯出「網絡」的重要，構成有別

於階序與市場的另種經濟發展模式。<sup>12</sup>

對戰後便駐軍日本，並藉冷戰局勢將影響力伸至太平洋沿岸的美國來說，東亞諸國的成就不但可抹去它在拉丁美洲失敗的不光榮紀錄，更有助於鞏固它在世界上的霸權。而東亞諸國經濟得以成功，除了跟有較佳的歷史基礎與自身的努力外，無疑亦深受美國主導下的冷戰結構影響，特別是外銷導向的工業化模式。面對前殖民地在戰後逐漸擺脫舊宗主國的影響，並日益從反帝的民族主義走向反美的發展趨勢，加上石油危機發出的警訊，美國在 1970 年代開始調整對外作為，逐漸減少直接軍事行動的分量，改以躲藏在「自由化」大旗下的金融資本主義來鞏固其政經霸權。在此情況下，東亞政治穩定與經濟成長的表現，在美國政界及學界鼓吹的現代化論述下，便成為支持美式生活方式與美國霸權的有力證據。問題是，撇開東亞成功的根源究應歸功於國家還是社會的爭議不論，東亞諸國的發展經驗實際上毋寧反駁了現代化理論，也對立基於拉丁美洲經驗的依賴理論構成解釋上的挑戰。

最直接而明顯反駁現代化理論解釋典範的經驗現象是，東亞的傳統文化並未隨著所謂的現代化而消失。<sup>13</sup> 雖然關於傳統文化到底有助於還是有礙於東亞的發展，迄今仍聚訟紛紜，但有趣且顯而易見的是，當東亞諸國在 1980 及 1990 年代初期經濟表現亮麗時，西方文獻對東亞的傳統文化表現出較多的肯定。相對地，隨著日本經濟

<sup>12</sup> Hsieh (2017) 指出兩種解釋實際上皆有不足，國家的扶植政策常以失敗告終，但網絡亦非萬能，而係寄生於國家打造的制度性設施，並有賴其代為解決失靈的問題。

<sup>13</sup> 如後殖民研究一再證明的，不論對西方或非西方地區來說，傳統和現代都非斷裂的零和關係。此處係轉述現代化理論視傳統與現代為互斥的看法，非本文立場，特此澄清。

在 1980 年代末期逐漸泡沫化，邁入 1990 年代後更迅速趨於破滅，而所謂經濟「自由化」又導致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西方看待東亞傳統文化的方式到世紀交替時便常又退回原本負面的觀點。然而，到了 21 世紀，當中國崛起日益成為無可爭議的事實，並逐漸取代日本先前的指標性地位後，對東亞傳統文化的評價就又向較正面的方向傾斜，乃致像杜維明開始討論起「東亞現代性中的儒家傳統」的問題，清楚顯示西方對東方的評價與理解往往隨著東方的表現與彼此的勢力對比而變。反倒一些東方學者出於對自身的熟悉而較能保持警覺，對這種往往近乎本質論式的文化論解釋有所保留——儘管盲目追隨者亦不乏其人。

站在台灣的立足點，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 1970 年代以前，主流敘事多半將西方的興起與霸權視為當然，而不太認為是個需費力研究與解釋的謎題。但隨著日本及東亞諸國的崛起，某程度感到威脅的西方，才不再逕自假定西方是所有國家必須模仿的唯一典範，開始致力探究、解釋西方領先的原因何在。像 Landes (1969) 不但主張科技變革與工業發展令西方勝出，更強調創新的精神才是勝出的真正根源。在這之後，試圖解釋「歐洲奇蹟」的文獻開始蓬勃發展，或是從經濟制度，或是從政治與軍事組織，或是從資本主義，或是從生態環境等不同視角切入。

如果我們夠敏銳，意識到現代性相關研究與論述的起伏，與其產生的時空環境有關，那麼我們或將能反省到以往所看不見的盲點：企圖「解釋」西方興起的現代性論述，對西方來說雖有其深刻反省的一面，但對非西方來說，卻可能是將西方的霸權與優勢「自然化」，繼續證成其不對稱支配地位的霸權論述。因為，像「國民生產毛額」這樣看似客觀中立的衡量指標，都不免有隱涵的規範性預設，發明及使

用這套認知技術與道德標準的歷史，實際上無法與全球不平等的歷史割裂開來看（Speich Chassé, 2013）。對更為宏觀，牽涉到諸多經特定觀點與價值立場選擇過後的再現，卻常偽裝為真實歷史的現代性論述來說，更是如此。

### （五）後現代的挑戰才真正催生現代性概念的流行

不過，一直要到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在理論與現實兩條互相交織的軸線影響下，現代性的問題意識與概念才真正蔚為流行。就現實面來說，主要是受到後工業社會來臨，消費社會日益成熟，各式電子傳播媒介日益普及，特別是資訊革命後深入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而東歐共產集團瓦解，資本主義下的自由民主體制看似獲得終局的勝利這個 Fukuyama 所謂「歷史終結」的世界局勢變化，更扮演了臨門一腳的角色。至於在理論與論述方面，則是從主張意識形態的終結、消費主義走向象徵消費，促成包括媒體與符號研究在內的文化研究大行其道，以及 1960 年代以來各式社會運動所促成的價值解放，以迄最後出現更鮮明地擁抱異質與多元的後現代性論述。

值得注意的是，率先討論現代性，引發美國及國際學界跟進，蔚為風潮的，是邁入 20 世紀後日漸喪失文化霸權的歐洲知識分子。同時，這時的討論主要係聚焦於後現代與現代的區分上。可以說是鼓吹、提倡後現代者為了劃界或對照，刻意以現代性，某個意義下同時也就是美國主導下的現代生活方式為箭靶，把啟蒙理性的鉅型敘事當作批判的首要對象，這才引發了不同意後現代論述者，以及不滿足於僅以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政體來刻畫現代社會的特徵，某個意義上也就是不滿足於以美國為現代文明的代表者，紛紛聚集在現代性的大旗

下，試圖藉各種重新詮釋來對抗，也因此才會出現諸如晚期現代性、流動現代性、第二現代性、反身現代性、全球現代性等概念。

如 Therborn 所告白的，成長於二次大戰後的世代往往將現代當做理所當然的預設不加反省，在遭到後現代論挑戰或者毋寧說譴責後，才驚覺現代不只是當代而已，而是具有特定意義的一種文化（Therborn, 2012: 272）。只是，捍衛現代性的新興研究雖在後現代論述刺激下反省了古典社會學的盲點與限制，但還是常像古典社會學一般，變成投射自己期望的現代性論述。當這些研究以理論討論的形式為之，而非實際研究現代社會究竟如何形成與運作，很少參考史學界最新的研究，或甚至不知道社會學既有關於傳統與現代社會的刻板印象早遭到挑戰與修正時，尤其如此。

例如，Giddens 及 Habermas 早年雖以關於資本主義、民族國家與公共領域等「歷史研究」起家，但當他們後來展開對現代性的理論探討時，卻與歷史研究的進展脫鉤，不但沒更新自己早先時代條件限制下的研究結論，更未跟上新的發展趨勢，修正對歐洲歷史的理解，以及特別是正視西方以外地區的發展與貢獻，甚至還出現倒退，把現代性（及隱涵的歐洲優勢）從 19 世紀上推到 17 世紀。鼓勵踰越，主張那裡有權力，那裡就有抵抗，而成為後殖民重要思想資源的 Foucault，同樣把公開行刑到監禁的轉變描繪成歐洲的特例，而對英、法殖民帝國在海外依然刻意採行公開行刑不置一詞，因此還是「在分析上將根本就不曾區隔開來的社會關係人為地切割開來」，而喪失了超越觀看現代性的帝國與西方中心視角的機會（Go, 2016: 89）。甚至，這些具有高度反身性的新理論發展，因為堅持完成自我批判的現代性計畫（Habermas, 1987）、強調正視當下，以踰越來展開啟蒙（Foucault, 1984），或是訴諸世界主義（Beck, 2006），而形成

一套比以往更穩固的現代性論述，把西方人及非西方人的目光引向西方真誠而深刻的自我批判，而繼續忽略西方中心觀對現代（世界）社會如何形成的歷史認識所造成的影響，亦即對西方與非西方歷史的雙重誤認。

約略與現代性概念同時流行起來的全球化的概念與研究，同樣助長了人們一開始把重點放在趨同的研究上，從而再次遮掩了內建於主流現代性論述中的歐洲中心主義。直到前共產主義國家的轉型經驗不如預期，同時又爆發所謂的「文明衝突」，證明歷史並未終結於美式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體制後，多元現代性的主張才慢慢流行開來。經此意識上的轉變，當社會學家再次回頭求助歷史研究，才赫然發現，世界史的研究累積已清楚指出，修正 19 世紀建立的關於現代社會的理解與意象實屬必要。現代性會成為社會自我描述的主要概念，建立在以現代作為歷史分期概念的架構上，而選擇以標榜自己為新這樣的方式來描述自己，無非是想凸顯自己不但有異於任何時間上在先的社會，同時也有異於空間上其他的社會。可是，晚近的研究恰恰指出，這種貶抑時間與空間上他者的現代性論述，在事實的層面常站不住腳。一方面，現代社會的誕生及其普及，並非一般通俗印象理解的始自 16 世紀，就是 19 世紀的西歐社會也不如我們通常所想那般現代；另一方面，現代社會的形成是世界各地彼此連結、互動的結果，而非以歐洲為單一中心向全球擴散所致（如見 Bhambra, 2007; Buzan and Lawson, 2015; Raj, 2007）。<sup>14</sup>

<sup>14</sup> 有學者因此開始鼓吹「全球歷史社會學」的必要，相關的研究綱領、議程設定與探索方向可參考 Gennaro Ascione and Iain Chambers 所編的 *Cultural Sociology* 第 10 卷第 3 期的專號，Alexander Anievas and Kamran Matin 所編的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World History*，以及 Julian Go and George Lawson 編的 *Global Historical Sociology*，此處無法詳論，尚請見諒。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主張歐亞大陸先前的發展更像平行而非分流，<sup>15</sup> 認為歐洲藉剝削殖民地才取得優勢，係歷史偶然而非必然的世界史研究日益流行，以及像後殖民等諸多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的論述紛紛出現（如 Bhambra, 2007; Blaut, 1993; Darwin, 2008; Pomeranz, 2000），加上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以大陸規模的「世界工廠」不斷高速成長，積累了巨額的外匯存底，到 21 世紀後更變成「世界市場」，從常用的宏觀經濟數據來看成為實力數一數二的經濟體，挑戰美國領導世界的地位，同時美國卻因一向過度消費的傾向，由次級房貸問題引爆金融危機，在 2008 年造成全球金融海嘯而國勢日漸陷於衰頹，故在邁入 21 世紀後，在西方又誕生了一批反映其不安的通俗文獻（如見 Niall Ferguson、Eamonn Fingleton、Wolfgang Hirn、Henry Kissinger 和 Frank Sieren 等人的眾多著作），並激發新一波解釋歐洲現代性何以誕生並贏得領先地位的熱潮（如 Duchesne, 2012; Landes, 1998; Mitterauer, 2010; Morris, 2010; Stark, 2014）。鑑於類似的現象自 19 世紀末以來反覆發生，如 Mokyr (1999) 者更不避諱地高聲歡呼歐洲中心觀的勝利，有理由把西方現代性的相關論述視為某種西方建立認識論霸權的象徵鬥爭工具，以及強化自信的心理防衛機制（比較 Halperin, 2006; Mignolo, 2002）。至少，有這始終存在卻一直被忽略的一面。立足、生活於台灣，我們實在不宜對此視而不見。

---

<sup>15</sup> 平行比喻雖傳達了其他地區與歐洲平起平坐的意象，卻易誤導人以為不同地區間毫無互動與關連。歷史的事實毋寧較像 Strayer et al. (1989) 的標題所示，在彼此連結、相互影響的同時，又各自保有相對獨立的自身發展動態與軌跡。

## 五、結語：勇於學會不學習

參照本文前面對現代、現代性的概念史探討，以及就現代化、現代性相關研究的知識社會學爬梳，我們不難得出如 Dussel 的論斷：「『現代性』因此是對世界體系的『核心地位』（centrality）的管理」（Dussel, 2002: 222）。就是像 Wallerstein 般有意識地反省歐洲中心觀的世界體系論，仍不免是 Dussel 所謂第二版的歐洲中心論。儘管這有所進步，將歐洲的霸權從通俗說法的古希臘或文藝復興限縮到五百年，但仍未承認「外部」其實扮有「構成性的」角色。本文嘗試更進一步，指證歐洲五百年前便一路領先的說法同樣是神話，現代性根本是 19 世紀才發明的概念，而且要到二次大戰後擺脫文明自陷毀滅的陰影後，特別是在美國主導的冷戰結構下，才慢慢形成看來只有光明面的主流現代性論述。

就如實際的歷史般，現代（性）論述的發展並非從灰暗到光明的簡單線性敘事所能概括，而是充滿了複雜、偶然與兩面性。不論是啟蒙或二戰以後，現代（性）都是在相對於時間或空間上的「他者」，才顯現出光明、進步，甚至變成一種霸權論述，同時卻又不曾停止自我批判。因此，我們看到：19 世紀末的歐洲既是繁華自信的高峰，同時又是深刻自我懷疑與自我反省的時代，但又內外有別；斷裂與漫長發展累積的矛盾遭到忽略，並透過內外有別的區分達成和諧並存；現代化理論最初是以高姿態向第三世界推銷，試圖超越它的歷史社會學轉回研究西方自身後，卻產生始料未及的鞏固霸權論述的後果等。

現代性是套西方中心的霸權論述，最明顯的證據莫過於，當原本強調時間斷裂的現代性概念發展成用來正當化西方霸權的主流現代性論述時，常把現代的根源或起點不斷地往過去延伸，以致令時間斷裂

變得模糊卻毫不自覺，連非西方的追隨者也常未意識到。對社會學家來說，這原是可輕易覺察的矛盾，因為從兩大革命急遽劇變的意象改頭換面成自 10 或 15 世紀以來的漫長發展與轉化，根本是兩套完全不一樣的故事。可是，經好幾代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各種研究發現與歷史事實鞏固歐洲中心的現代性論述後，這套論述如今幾成了學習社會學的學生與生俱來、不證自明的觀點。甚至認定單一因素的初次發生便決定了此後的長期優勢這樣一種經不起實際歷史檢驗的歷史哲學觀，都很少被認真反省與檢討。

如前所述，這跟美國在冷戰格局下成功將現代性霸權化有很深的關係，讓現代性不止於是光明的象徵，更取得知識與道德上的領導權。藉由這套霸權論述提供正當性，現代世界經歷了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化、工業化、都市化、國民義務教育、大眾選舉政治、消費社會等各種迅速的發展與成長，也因此贏了共產主義競爭模式的同時，必須承擔起過去肆無忌憚的發展的後果，面對自己創造出來的，充滿各種社會與生態危機的「風險社會」，而再次引發對現代性的深刻反思，摘掉其過往看似神聖的光環（如 Beck et al., 1994）。這個自我反省與批判的新發展固讓現代性獲得新的動力，卻也再次證實，在主流現代性論述中，不但殖民帝國的過往依然少獲反省，西方以外的他者更根本排除在外，不具任何重要性。

面對現代性概念在社會學中的可見度與重要性隨時代而變，同時社會學在現代性論述中的角色與作用也隨時代脈絡而變的事實，我們實有必要深加反省，找到台灣該如何看待現代性才比較合適的位置，建立自己理解現代社會究竟如何形成的論述。藉由揭露現代性論述西方中心的霸權性格，指出現實與論述之間的落差，本文希望能激發大家重新認識現代性的興趣，一同反身地尋覓適合台灣介入及重構現代

性論述的切入點，並相應在新論述裡賦予台灣恰如其分的定位。

畢竟，光是生活在台灣不足以保證我們有自己的觀點，在地的立足點／觀點是需要經學術和政治的努力來達成和經營的。例如，台灣不但是見證美國霸權興起的重要實驗室，還曾經充當美式現代性論述往第三世界推廣的樣板，但在西方或美式主流現代性論述裡，台灣的角色只能是「追隨者」、「獲益者」或甚至「被解救者」。然而，如果我們如本文主張的，改從相互連結的歷史或全球歷史社會學的觀點重新審視這段歷史，將會發現，台灣至少扮演了關鍵的「中介者」角色，甚至在現代性的形成上同樣有「構成性的」角色。當我們從這樣的視角修正既有的現代性歷史敘事，才能真正克服其始終未能擺脫的西方中心盲點，剝除其霸權性格，實現其自我批判與超越的理想。

台灣的科技與社會研究社群已自信地喊出「我們不曾後進過」的口號 (Lin and Law, 2015)，身為社會學者，我們雖不必效法、踵繼其步伐，但毋寧應提出我們自己的研究議程，營造我們自己的立足點，避免因著「自我後進化」而來的劃地自限與跟隨者心態，乃至誤認或誤判現實。現在，是到了重新認識現代性，並由此重新講述台灣故事的時候了！我們不但要有不服從的勇氣，還必須學會何時不該學 (Tlostanova and Mignolo, 2012)，如此才能善用西方觀點主導下的理論、觀點或概念卻又不會被其綁住，而能以本地歷史真實開展出的現代性軌跡，豐富及推進社會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Wagner, 2010)。<sup>16</sup>

<sup>16</sup> 從在地視角出發，我們或許必須對打造或追求「符合台灣主體性的世界觀與歷史觀」一事加上括號或問號，因「主體性」本身就是西方啟蒙現代性值得檢討的判準 (范綱華, 2014, 頁 45、245)。本文重點在倡議發展台灣自己認識世界與歷史的觀點，使用「主體性」一詞係圖行文方便，並不主張純然以自我為中心的視角，遑論有我無他的全能或全景視角。本文提倡的相互連結的歷史的立場，基本上也有別於所謂主體性的視角。但這是個超越本文能力範圍的大問題，有待高明。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朱元鴻

- 2014 〈百年來戰爭與革命組態的改變〉，收錄於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聯經，頁97-155。

Chu, Yuan-Horng

- 2014 “The Changes of War and Revolution Constellation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in Horng-Lun Wang ed., *War and Society: Theory, History and Subjective Experiences*. Taipei: Linking, pp. 97-155.

李丁讚、吳介民

- 2005 〈現代性、宗教與巫術〉，《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9期，頁143-184。

Lii, Ding-Tzann and Jieh-Min Wu

- 2005 “Modernity, Religion, and Magic,”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59: 143-84。

范綱華編

- 2014 《本土理論再想像》。新北市：群學。

Fan, Gang-Hua ed.

- 2014 *Reimagining Native Theory*. New Taipei City: Socio.

馬漢

- 2013/1890 《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附亞洲問題》，李少彥等譯。北京：海洋出版社。

Mahan, Alfred Thayer

2013/1890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trans. by Shao-Yan Li. Beijing: Ocean.

黃金麟、汪宏倫等編

2010 《帝國邊緣》。台北：群學。

Hwang, Jin-Lin, Horng-Lun Wang and Chung-Hsien Huang eds.

2010 *At the Edges of Empire*.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Co.

黃瑞祺

1996 〈現代性的省察〉，《台灣社會學刊》，19期，頁169-211。

Hwang, Ruey

1996 “Reflections on Modernity,”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19: 169-211。

## 外文部分

Amadae, S. M.

2003 *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msden, Alice H.

2001 *The Rise of “the Rest”: Challenges to the West from Late-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rnason, Johann P.

1991 “Modernity as Project and as Field of Tensions,” in Axel  
Honneth and Hans Joas eds.,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pp. 181-213.

Baechler, Jean, John A. Hall and Michael Mann eds.

1988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Barnes, Harry E.

1917 "Sociology before Comte: A Summary of Doctrines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3(2): 174-247.

Beck, Ulrich

2006 *The Cosmopolitan Vision*. Cambridge: Polity.

Beck, Ulrich,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1994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Bentley, Jerry H.

2006 "Beyond Modernocentrism," in Victor H. Mai ed., *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 17-29.

Bhambra, Gurminder K.

2007 *Rethinking Modern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Blaut, James M.

1993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Bonnett, Alastair

2004 *The Idea of the We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Bourdieu, Pierre

2004 *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rowning, Christopher S. and Marko Lehti eds.

2010 *The Struggle for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Buzan, Barry and George Lawson

2015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eng, David Te-Chao

1944 “Review: *Free China’s New Deal* by Hubert Frey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31: 180.

Conze, Werner

2004 “Revolution. Rebellion, Aufruhr, Bürgerkrieg,” in vo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and Reinhart Koselleck eds.,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Bd. 5*. Stuttgart: Klett-Cotta, pp. 653-791.

Darwin, John

2008 *After Tamerlane*. New York: Bloomsbury.

Duchesne, Ricardo

2012 *The Uniquenes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Leiden: Brill.

Dussel, Enrique

2002 “World-System and ‘Trans’-Modernity,” *Nepantla* 3(2): 221-244.

Ernst, Daniel R.

2014 *Tocqueville’s Nightma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elds, David

2015 “Dollar Hegemony,” in Louis-Philippe Rochon ed., *The Encyclopedia of Central Banking*.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pp. 145-147.

Foucault, Michel

- 1984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pp. 32-50.

Fousek, John

- 2000 *To Lead the Free World*.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Gassert, Philipp

- 2012 “The Spectre of Americanization: Western Europe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in Dan Stone ed., *Postwar Europea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82-200.

Germann, Julian

- 2011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risis of the 1970s: The Real ‘Transatlantic Divide’,” *Journal of Critical Globalisation Studies* 4: 10-22.

Gerschenkron, Alexander.

-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ilman, Nils

- 2003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Go, Julian

- 2016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umbrecht, Hans Ulrich

2004/1978 “Modern, Modernität, Moderne,” in vo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and Reinhart Koselleck eds.,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Bd. 4*. Stuttgart: Klett-Cotta, pp. 93-131.

Habermas, Jürgen

1987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Halperin, Sandra

2006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Hegemony of Western Conceptions of Modernity,” in Branwen Gruffydd Jones ed., *Decolon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ham: Roman & Littlefield, pp. 43-63.

Harding, Sandra ed.

2004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9 *Commonweal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Hayes, Carlton J. H.

1932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New York: Macmillan.

Hayes, Carlton J. H., Marshall Whithed Baldwin and Charles Woolsey Cole

1962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since 1500*. New York: Macmillan.

Hayes, Carlton J. H., Parker Thomas Moon and John W. Wayland

1955/1932 *World History*. (3rd revised ed.) s.l.: s.n.

Higgs, Robert

2006 *Depression, War, and Co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sieh, Michelle F.

2017 “Governing Taiwan’s Decentralized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at “Modernity Reconsidered: An East Asian View on Theoretical Genealogies and Historical Comparisons”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March 24-25.

Hunt, Lynn

2007 “Modernity and History,” in Lynn Hunt, *Measuring Time, Making History*.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pp. 47-91.

Jauß, Hans Robert

1971 “Antiqui/modern,” in Joachim Ritter ed., *Historische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d. I*. Basel: Schwabe, pp. 410-414.

Koselleck, Reinhart

2002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the Beginning of Modernity,” in Reinhart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54-169.

2011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6(1): 1-37.

Laidlaw, Walter

1911 “The Church and the City Comm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6(6): 794-804.

Landes, David S.

1969 *The Unbound Prometheu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Norton.

Lerner, Daniel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Glencoe, IL: Free Press.

Lin, Wen-yuan and John Law

2015 “We Have Never Been Latecomers!?”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9: 117-126.

Lippmann, Walter

1929 *A Preface to Morals*. Boston: Beacon Press.

MacNair, Harley Farnsworth

1941 “Review: Japan Since 1931: Its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by Hugh Borton; The Struggle for North China, by George E. Taylo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15: 184-185.

Maier, Charles S.

2006 *Among Empires: American Ascendancy and Its Predecesso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ignolo, Walter D.

2002 “The Enduring Enchantment (or The Epistemic Privilege of Modernity and Where to go from here),”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01(4): 927-954.

Mitterauer, Michael

2010 *Why Euro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kyr, Joel

1999 “Eurocentricity Triumphan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4(4): 1241-1246.

Morris, Ian

2010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Oldenziel, Ruth and Karin Zachmann eds.

2009 *Cold War Kitche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Osborne, Peter

1992 “Modernity is a Qualitative, Not a Chronological, Category,” *New Left Review* 192(1): 65-84.

Peukert, Detlev

1992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Crisis of Classical Modernity*. New York: Hill & Wang.

Pomeranz, Kenneth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aj, Kapil

2007 *Relocating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Rostow, Walt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How It All Began: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 London: Methuen & Co Ltd.

Shah, Hemant

2011 *The Production of Moderniz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Shapin, Steven

1996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peich Chassé, Daniel

2013 *Die Erfindung des Bruttosozialprodukt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Stark, Rodney

2014 *How the West Won*. Wilmington, Delaware: ISI Books.

Steinberg, John W. et al. eds.

2005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Zero*. Leiden: Brill.

Strayer, Robert W. et al.

1989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onnected Histories, Divergent Path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tuder, Roman

2015 *The Great Divergence Reconsider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Charles

1995 "Two Theories of Modernity," *The Hastings Center Report* 25(2): 24-33.

Therborn, Göran

2012 "From Civilization to Modernity," in Said Amir Arjomand ed.,

*Social Theory and Regional Studies in the Global Age*. New York: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267-289.

Thomas, William I.

1908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rient for the Occid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3(6): 729-755.

Tlostanova, Madina V. and Walter D. Mignolo

2012 *Learning to Unlearn*.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Wagner, Peter

1994 *A Sociology of Modernity: Liberty and Discipline*. London: Routledge.

2001 *Theorizing Modernity: Inescapability and Attainability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2008 *Modernity as Experience and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Polity.

2010 “Multiple Trajectories of Modernity: Why Social Theory Ne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sis Eleven* 100: 53-60.

2012 *Modernity: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Cambridge: Polity.

Wallerstein, Immanuel

1996 “Three Ideologies or One?” in Stephen P. Turner ed., *Social Theory & Sociolog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p. 53-69.

White, William Allen

1925 “The Larger Cycle of American Development,” *Social Forces* 4(1): 1-5.

Williams, Raymond

1983/1976 *Keywords,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both an ethical and an epistemological necessity to re-cognize modernity from a native perspective. Once we dare to give up the conventional perspective, problematize modernity, and explore its contingencies and complexities in history, we will know that the mainstream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ty is a Eurocentric hegemonic discourse. This discourse has not only created many myths about Europe, but also has led us to misunderstand our own history – we were even glad to do so.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modern” and modernity as well as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bout research on 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 Putting them back in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alternating hegemony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on the one hand and between Europe and the USA on the other hand, and exploring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the reference to “the West”, I demonstrate why modernity is a hegemonic discourse. Finally, I appeal for an active search for Taiwan’s standpoint and, with this, build a local view about the world and history.

*Keywords: modernity, conceptual history, the West, Eurocentrism, Taiwan as standpoint*

## Long Summa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both an ethical and an epistemological necessity to re-cognize modernity from a native perspective. Once we dare to give up the conventional perspective, problematize modernity, and explore its contingencies and complexities in history, we will know that the mainstream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ty is a Eurocentric hegemonic discourse. This discourse has not only created many myths about Europe, but also has led us to misunderstand our own history – we were even glad to do so.

The constitutive role of language is widely recognized after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turn. Therefore we cannot speak of modernity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the term “modernity,” as Peter Wagner stressed. However, the mainstream often conflated modernity with the “modern period” of European history, or traced it back to the Enlightenment, Renaissance, Christianity or even the ancient Greek. This article first explores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modern” and modernity to dispel such myths. Although the adjective “modern” already appeared in the fifth century, it won a totally positive evaluation only until the 17<sup>th</sup> century and served as periodization since 18<sup>th</sup> century. The noun “modernity” was an even later product. It appeared only in the 19<sup>th</sup> century and was almost never used by the founders of sociology despite that today’s sociology tends to see itself as son of modernity and produces many books to interpret those founders’ notion about modernity.

In other words, it is a contemporary projection if anyone discussed modernity before the 19<sup>th</sup> century. Actually the term modern had already played such a role, though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when it functioned as periodization. In order to confirm and praise itself, it projected its contemporary imagination to the past and constructed the temporal “other” as Dark Age. Modernity alike was a weapon of symbolic struggle. It emphasized not only a temporal, but also a spatial rupture. Namely, only the modern western society or civilization had developed modernity and was far more progressive than any other societies. Nevertheless, there were always some worries or anxieties hidden behind. While the European of the end of the 19<sup>th</sup> century enjoyed various material progresses and were confident and content, they were also pessimistic about their future and fate. The only thing that didn’t change was they saw themselves superior to other people.

However, I found unexpectedly an interesting fact after searching the jstor databank. The term modernity was still not widely used before 1945 and definitely not a key concept. But in the limited cases that used the term modernity or modernization, the attention to East Asia, especially China and Japan, was very significant. Those discussions revealed that the West felt superior and “threatened” at once. In fact, the West was also a construction of 19<sup>th</sup> century. Its function was to include the rising Russia and the USA. Although the USA was the biggest winner of the World War Two, it did not win the political hegemony to lead the world at once in 1945, not to mention the cultural hegemony. It was a long and

heterogeneous alternation of hegemony between the old European powers and the USA. The success of USA's cooperation with East Asian countries like Japan and Taiwan in the postwar Cold War period not only canceled its dishonor in the Latin America, but also helped it finally to seize the cultural hegemony in 1980s.

This article turns the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bout the researches of 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 The aim of the theory of modernization was to modernize the so called the Third World. It was therefore not result of studies of western societies, but a sum of assumptions based on many projected dichotomies. Its exemplar jumped from European past to the USA's present. In the contemporary aura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independence many native elites of the Third World actively and passionately responded to the idea of modernization because they thought it better than colonialism.

The theory of modernization began to decline because the changing world political conjuncture, the rising various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emerging new theories in academics in the end of the 1960s. What is worth to attention was the rise of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It tried to go beyond the uni-linear and Eurocentric framework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by bringing history back. However, when it turned its sight from the Third World back to the European past, it produced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Despite that their comparative framework tried to be objective and neutral, it was an unachievable ideal due to the cultural blind spot und intellectually unequal familiarity. The result was nothing but to confirm

their assumption or departure: the European long term superiority due to the modernity.

Two lines were remarkable in the succeeding development. First, the rise of East Asia (from Japan via four tigers to China) stimulated waves of exploring and explaining the success of the West time and again. In a sense, we can say that the concern about East Asia's catch-up was the promoter of modernity discourse. And it was always so after the concept modernity was coined.

Second, the European intellectual fought back as they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they have lost the cultural hegemony. The first attack was the claim of postmodernity. Some European intellectuals thought this gone too far, but were also very discontent with the USA style modernity whose core was formal democracy,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consumptionism. They therefore developed various versions of modernity. Actually, the concept modernity only became popular in the sociological circle after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It is worth to note that thes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were almost pur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did not take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m into account. If the classic sociology was ahistorical historicism, the up-to-dated sociological theory wants to give up historicism. Therefore, the new discourse of modernity was still Eurocentric and not aware of the fact that modernity actually formed in the interactions of various world regions as they were connected to be one and the same modern world society. However, the new discourse of modernity

was attracting because it was highly reflexive. This made its hegemonic character invisible.

If we take the standpoint theory seriously, the conclusion seems to be obvious. We should actively search for Taiwan's standpoint and build our own point of view. If we replace the Eurocentric framework with Taiwan's perceptive, we will find that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aiwan of course, had played a constitutive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ity. To re-cognize moder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nected histories had therefore both eth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legitimacy.